

## 錢玄同對章太炎學術思想之取捨\*

王銳\*\*

### 摘要

章太炎與錢玄同清末相識於日本，彼時錢玄同甚為崇拜前者，不但仔細閱讀其著作，還在日記中記下心得，同時極力迴護章氏，非常不滿與其觀點相左者。當章太炎決定設壇講學後，錢玄同奔走聯絡，促成其事。並在此其間常向章氏問學請益，二人學術上的交流甚頻繁。在人生觀方面，章、錢頗有共識，即強調「辨誠偽」，對改善民德三致意焉。錢玄同青年時代接觸到大量晚清國粹派之學說，並對章太炎藉國粹激動種性心有戚戚焉。因此他主張未來中國應全盤復古，從語言文字，到典章制度，皆應保持中國自身特色。然民國建立後，錢玄同目睹袁世凱帝制自為，深受刺激，是故對中國傳統的態度急轉直下，鼓吹應徹底批判。猶有進者，錢玄同認為漢字是阻礙中國發展的主要禍首，於是提倡廢除漢字，而在這表像背後，其實顯示出在思維方式上依然深受章太炎影響，即非常重視語言文字在一國文化中的地位。錢玄同雖然師從章太炎，但對乃師經說吸收之處卻著實有限。他在清末接觸到晚清今文經學後，便頗認可其中的托古改制、素王變法之論，並對康有為、崔適的辨偽著作青睞有加。在以反傳統為旨歸的古史辨運動中，這些學術積累一觸即發，提供錢氏遍疑群經，推翻古史系統豐厚的思想資源。而在此主旨下，章太炎經學觀中帶有批判色彩的部分遂被錢玄同給予部分肯定，然其「建設」的面向，卻非已立志抨擊舊學的錢玄同所能理解。

**關鍵詞：**錢玄同、章太炎、太炎學派、經學、語言文字之學

---

\* 兩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了許多極有助益的意見，特表謝忱。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 一、前言

1923 年，胡樸安（1878-1947）如是評介民國以來的國學研究：「開民國學術群眾運動之先河，有二大團體焉。一國學保存會，一南社。」其中國學保存會，「抱光復漢族主義，闡發亭林、船山之學說，發行《國粹學報》，一時撰述之士，如章太炎（1869-1936）、劉申叔（1884-1919）、黃晦聞（1873-1935）、陳巢南（1869-1933）、黃季剛（1886-1935）等，鄙人亦為撰述員之一，一時影響所及，學術界勃然有生氣焉。」及至民國肇建，「《國粹學報》停刊，然而東南學者，皆受太炎影響，《國粹》雖停，太炎之學說獨盛。北京大學者，學術薈萃之區也，為姚永概（1866-1923）、馬通伯（1854-1929）、林琴南（1852-1924）所佔據，不學無術，奄奄一息焉。自劉申叔、黃季剛、田北湖（1877-1918）、黃晦聞，應大學之聘，據皋比而講太炎之學，流風所播，感應斯宏。自申叔貶節，媚於袁氏（世凱，1859-1916），而有《中國學報》之刊，國師之譏，學術大受打擊。所幸《華國》及東南大學之《國學叢刊》，皆《國粹學報》之一脈，而為太炎學說所左右者也。」<sup>1</sup>誠如所言，章太炎自清末起便在學界影響極大，其學說不論反對抑或贊成，皆引起許多關注。進入民國後，章太炎一度醉心於政治活動，在一些人看來乃「墮落」的表現。金毓黻（1887-1962）在當時就批評：「章太炎氏之學，精約獨至，前無古人。考其成功，乃在流離顛沛之時，迫而後出，亦緣憂憤。及至近三、五年，處境漸亨，著述之業，轉見衰歇，間有言論，乃近政客。」<sup>2</sup>在新文化運動中名聲驟起的胡適（1891-1962）更是如此評價包括章太炎在內的老輩學人：「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1877-1927）、羅振玉（1866-1940）、葉德輝（1864-1927）、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1873-1929）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

<sup>1</sup> 胡樸安，《民國十二年國學之趨勢》，收入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302-303。

<sup>2</sup>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第1冊，頁80。

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sup>3</sup>

雖說如此，以章太炎諸門生為代表的太炎學派，在近代中國學術界依舊盛極一時，地位不容小覷。除胡樸安所提及的北京大學文科外，許壽裳（1883-1948）、錢玄同（1887-1939）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多年。之後中央大學成立，汪東（1890-1963）、黃侃、朱希祖（1879-1944）等人皆為文學院中要角。而以上諸人之門生，在武漢大學、湖南大學等高校中亦有不小影響力。1949年大陸政權易幟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也長期被跟隨國民黨渡海而來的林尹（1910-1983）、潘重規（1908-2003）等太炎弟子掌控。<sup>4</sup>

然章太炎雖弟子眾多，但師承之間依然有所落差。或許有感於此，章氏晚年才會強調師徒間「二國手三國手門下能出大國手，大國手門下不能更出大國手」這樣意味深長的話。<sup>5</sup>但在近代中國這一各種思想學說相互激蕩、學界新舊關係錯綜複雜的場景下，個人學術見解除了理解師說的深淺與寬窄外，更離不開每個人對時代思潮的感觀與迎拒。沈尹默（1883-1971）晚年回憶：「太炎先生的門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舊派，代表人物是嫡傳弟子黃侃，這一派的特點是：凡舊皆以為然。第二派是開新派，代表人物是錢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稱『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間派，以馬裕藻（1878-1945）為代表，對其它二派依違兩可，都以為然。」<sup>6</sup>後來對三禮之學與宋明理學頗有心得的吳承仕（1884-1939），更是轉而信仰共產主義，成為1930年代北方中共地下組織中重要人物之一，積極參與中共地下黨的各種活動，其

<sup>3</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第3冊，頁734。

<sup>4</sup> 關於太炎學派在民國學界中地位之不容小覷，參見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歷史研究》，3（北京，1999.6），頁28-32。

<sup>5</sup> 章太炎，《荊漢閒話》，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5冊，頁100-101。

<sup>6</sup> 沈尹默，〈我和北大〉，收入國文史出版社編，《文史資料精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第5冊，頁428。

「激進」程度較之所謂「開新派」有過之而無不及。<sup>7</sup>在這樣不同思想背景下，各弟子對章太炎學術之繼承與評價自然各有差異。所以研究章太炎學術思想，除了要對他本人各種言論仔細繹讀分析，還應注意到其門生對師說的認識與詮釋，由此可更為全面的展示章太炎學術思想的影響及其本人學術形象。並且通過具體梳理各種認識與詮釋中所體現出的繼承與揚棄，再與章氏本人思想比對，探討其間的固守與變異，從中或可進一步認識近代中國的學術流變。

章太炎的幾位主要弟子，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氏兄弟、許壽裳等，皆有日記傳世，這對展開以上工作極有助益。在這其中，錢玄同的日記內容尤為完整且豐富，他記下了大量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並且生前並未打算像曾國藩（1811-1872）、胡適、蔣介石（1887-1975）那樣將其公之於眾，故言論真實度極高，幾乎無刻意修飾之處。讀其日記，錢氏性情與神態躍然紙上，藉此以知人論世，雖不中，亦不遠。錢玄同一生主要以治學為業，重點放在經學與小學領域，他自言：「我很喜歡研究所謂『經』也者。」<sup>8</sup>章氏也稱弟子當中「季剛、季中（錢玄同）皆明小學。」<sup>9</sup>這與章太炎所主要致力者極相似。此外，錢氏思想上的變化表面上看起伏極大，許多言論不但影響頗廣，並且往往流於「極端」。作為章太炎比較親近的幾位弟子之一，他對師說究竟有何取捨？背後考慮為何？若撥開表象，二人有無一脈相承之處？凡此種種，皆值得仔細梳理，藉此展現在近代中國學術界地位重要的太炎學派內部頗為複雜的面貌。<sup>10</sup>本文擬以錢玄同為例，藉助他留下

<sup>7</sup> 關於吳承仕參與中共地下黨工作的史事，可參見吳承仕同志誕生百週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週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一書，此書收錄多篇吳承仕弟子的回憶文章，其中對吳氏的政治活動有很豐富的描述。

<sup>8</sup>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第4卷，頁237。

<sup>9</sup>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頁14。

<sup>10</sup> 關於錢玄同思想中的師承因素，張榮華曾以1930年代章太炎北上講學的史事為中心展開分析，認為維繫章、錢二人關係頗為緊密的紐帶是他們相同的人生觀與處世態度。這一看法，對理解二人的關係極有啟發。參見張榮華，〈錢玄同思想中

的日記，並佐之以其他相關史料，探討章太炎學術思想對弟子的具體影響。

## 二、師生交誼

錢玄同晚年從事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受人之託整理劉師培遺著。為了這件事，他與擔任校對一職的鄭裕孚（1882-?）通信頻繁，在1938年的一封信裡，錢玄同說：

此十餘年中，弟對於申叔之學，說老實話，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節有虧也，實因其思想守舊，其對於國學之見解與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來，弟讀書稍多，不特對於申叔所論，不同意處甚多，即對於先師章公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sup>11</sup>

錢玄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高唱打倒傳統文化，宣揚疑古，這些在表面上皆與章太炎一生念念在茲的將中國傳統學術發揚光大明顯背道而馳，故他直言對後者學說「多有不敬苟同者」。不過即便如此，他對章太炎依然感情深厚。朱希祖在1936年章太炎去世不久後的日記中寫道：「午後三時錢玄同來，談先師生平事跡，並及康心孚（1884-1917）慫恿先師為文承認帝制後，袁世凱大總統許以出京，後又不許出京，故有告巡警總監妨人遷徙之狀。又言周啟

---

的師承因素（代導言）》，收入張榮華，《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錢玄同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1-10。此外，王汎森根據黎錦熙的《錢玄同先生傳》，認為「錢氏固受章太炎影響，但卻絕不能與章太炎等同，他已經遠遠超出章氏的範圍，把章氏的舊說加以徹底的激烈化了。」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頁143。盧毅在《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一書裡，對章太炎的幾位主要門生之言行進行論述，關於錢玄同，主要著眼於他對新舊文化的抉擇、宣導漢字革命、參與古史辨運動三方面，雖頗為全面，但並未過多梳理章、錢之間的傳承與歧異。參見盧毅，《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頁60-66、頁141-159、頁201-214。劉克敵與盧建軍在討論章太炎及其門生的經歷時，曾描述錢玄同的種種激進言行，但所據多為錢氏發表的文章以及後人回憶，並未過多參考其日記。同時對錢玄同思想立場漸趨激進的過程，論述有失單薄。參見劉克敵、盧建軍，《章太炎與章門弟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頁140-155。

<sup>11</sup> 錢玄同，〈致鄭裕孚〉，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6卷，頁299。

明曾為〈謝本師〉文，後又承認本師之事。又談先師與孫中山（1866-1925）離合事，謂辦《民報》時已相惡，及民國元年中山為大總統，聘先師為顧問，再三辭，不受。劉光漢始與先師為學問友，後投端方（1861-1911），始相交惡。元年光漢從端方至四川，川人殺端方，執光漢，電告南京政府，陸軍總長黃興（1874-1916）電川解南京正法，先師始作書致中山，謂：『明成祖（1360-1424，1402-1424 在位）殺方孝孺（1357-1402）滅讀書種子，人皆惜之，方今正宜留有學術之人共治國家，發揚文化，如能不殺光漢，方見待士有禮，余亦願來京就職矣。』中山乃電川放光漢，並覆書先師速駕，先師乃至南京，於是重歸於好。其後中山在廣東為大元帥，先師為大元帥府秘書長，直至中山容共，乃又離矣。其他所談遺聞逸事甚多，不及記矣。蓋玄同記性極好，余極喜與談也。五時玄同始去。其時玄同血壓極高，左目失明，而對先師頗眷念不忘，欲在北平為先師開追悼會云。」<sup>12</sup>錢玄同談興極盛，早已為時人熟知，周作人（1885-1967）即回憶，當年他們在東京聽章太炎講學時，錢玄同「每當先生講了閒談的時候，就開始他的『話匣子』。」<sup>13</sup>而由朱希祖所記的這個例子，可見錢玄同對章太炎的懷念出於至誠，十分真摯，談起陳年往事滔滔不絕，全然不顧自己身患重病，師生之間的關係並未因思想上的歧異而打折扣。所以梳理章、錢師徒二人之交誼，極有助於理解他們思想上的傳承與轉變。

1905 年，錢玄同之兄錢恂（1853-1927）出任湖北省留日學生監督，錢玄同藉此機會隨兄長一同赴日，就讀於早稻田大學。他與很多當時留日學生一樣，留心國內政治、學術的各種情況，非常關注在日本發行的革命、立憲兩黨之報刊。在 1906 年 9 月 19 日的日記裡，錢玄同記下「購《民報》、《國學講習會略說》等。」<sup>14</sup>數

<sup>12</sup>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中冊，頁692。

<sup>13</sup> 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收入沈永寶編，《錢玄同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7。

<sup>14</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上冊，頁58。

日之後，他又「至《民報》社，定《國學講義》及《革命評論》。」<sup>15</sup>過了一個多月，他看到「《民報》首有章太炎《無神論》一篇，駁耶穌之自相矛盾，極好」，認為章氏之文「迥非時流諸人可以言及之也。」<sup>16</sup>1906年章太炎東渡日本，主《民報》筆政。章氏為樸學大家俞樾（1827-1907）的弟子，在江浙學界本來就有一定地位，且自從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以來，在士林名聲日盛，由他擔任主筆，《民報》上的文章更顯犀利、深邃，影響也越發廣泛。而他在宣傳革命同時還設壇講學，實踐自己「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之願望。<sup>17</sup>錢玄同這裡提及的《國學講習會略說》，很可能為1906年9月在日本秀光社印行的同名之書，其中收錄了章太炎講語言文字之學、文學、諸子學的講義。

在這段時間錢玄同曾專門致信章太炎，雖然錢氏原函今已不能窺見，但章太炎的回信卻猶存世間。章氏對他說：「得書知君為好學研精之士」，因此詢問錢氏，「期欲握手，契以何日？」同時談及「此間耳食者多，微言大義則易受，發疑解滯則難知，亦無術以更之也。」<sup>18</sup>他向錢玄同吐露不滿當時學風，可見已視錢氏為能與深交之人。及至該年10月21日，錢玄同遂往章太炎處拜訪，他在日記中說：「下午訪西狩，道貌藹然，確是學者樣子。入室見滿架皆舊籍。西狩方握筆作內典學文字，與之談及近人一切，並代布宣定《國學講義》一份。後觀雲來，余乃走。」<sup>19</sup>此番二人相見之後，錢玄同遂不斷關注章太炎的文章著作。1904年嚴復（1854-1921）翻譯出版甄克思（Edward Jenks, 1861-1939）的《社會通詮》，闡揚其中所主張的社會進化階段論，認為民族主義乃「宗法社會」之產物，中國今日急需由「宗法社會」步入「軍國社會」，故不應提倡「排滿」。此論一出，影響頗廣，許多人論述中國歷史與

<sup>15</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60。

<sup>16</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62。

<sup>17</sup> 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收入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3。

<sup>18</sup> 章太炎，〈與錢玄同〉，收入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99。

<sup>19</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64。

現狀時常援引該書理論，這頗不利於革命黨的理論宣傳，因此章太炎決定撰文反駁嚴復。此文刊出後，錢玄同記下讀後感：

《民報》十二號出矣，太炎先生又有《社會通詮商兌》一篇，駁嚴氏之書。夫嚴氏為今世一般人所看重，所譯者又為哲理深邃之書，其有顛倒原文，淆亂真意之處，人固難以識別。今以章氏之學識、之卓見，糾而正之，固有功社會不淺也。此外汪、林二君駁梁氏文者，亦皆精思偉論。《民報》自太炎來後，固大放異彩，一至於此，真令人佩服。<sup>20</sup>

可見，錢玄同堅決認同章太炎的觀點，他閱讀《民報》，主要便是關注章氏文章，在他看來，《民報》之所以能獨樹一幟，與章太炎擔任主編息息相關。當時章太炎主張聯合印度等同樣深受帝國主義之苦的亞洲國家，對此錢玄同亦深表贊同，認為「太炎惓惓友邦，深慨彼此同病相憐，毫無菲薄意，此等度量，自非他人所能測矣。」<sup>21</sup>後來同盟會內部出現分裂，章太炎與孫中山交惡，從革命陣營中出走的劉師培等人將章氏信函公開，揭露後者交通張之洞（1837-1909），意圖放棄革命，剃髮為僧。對此錢玄同指陳：「在民報社見《萬朝報》，有一節言太炎辭革命事而為僧侶，且與張之洞之偵探通情云云，是必汪公權所為。人之無良，一至於此，殊為可恨！太炎前之遷出，本因小有口角（為溥泉事）。此事本汪理屈，而今又為此，是真小人之尤矣。」<sup>22</sup>他極力維護章太炎的形象，認為諸多指控，皆是小人行徑。而當章太炎與《新世紀》中的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錢玄同也深表支持：「至太炎處，見太炎正為〈四破論〉一篇。破（一）進化、（二）公理、（三）自然、（四）□□。此文若出，足箝《新世紀》諸獠之口。」<sup>23</sup>總之，錢玄同之於章太炎，幾乎已至亦步亦趨的境地，如此也令二人關係

<sup>20</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89。

<sup>21</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96。

<sup>22</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27。

<sup>23</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33。

愈發親近。其實深受章太炎文章吸引，進而投其門下，在當時絕非錢玄同一人如此。後來成為章太炎學生的朱希祖，同樣是先閱讀《煊書》中的〈清儒〉篇，由此「始知清代經學之派別」，於是數日之後，遂「至帝國教育會聆章先生講〈說文序〉。」是日晚間還「閱章先生所著《論語言文字學》一篇。」<sup>24</sup>

1908年，章太炎在東京主編《民報》同時，還為幾位留日青年講授國學。<sup>25</sup>許壽裳後來回憶：「民元前四年，我始偕朱蓬仙（1881-1919）、龔未生（1886-1922）、朱邊先、錢中季、周豫才、啟明昆仲、錢均夫（1880-1969），前往受業。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師寓所，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几。先師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見，層出不窮。」<sup>26</sup>關於章太炎講學事，錢玄同在是歲的3月22日「上午與味生至太炎處，意欲請太炎來講國學（先講小學），炎首肯。」<sup>27</sup>在講學場所的安排上，據朱希祖日記記載，先是在清風亭、後至帝國教育會、再移於大成中學，地點幾經輾轉。<sup>28</sup>章太炎為此事曾致信錢玄同：「講習會設在帝國教育會中，聞每月需費二十五元，此難為繼。弟近已租宅小石川大塚町五十番地（風景最佳，如在園林中），書籍行囊，業已遷入（陶望潮亦居此）。樓上席十一張，不如就此講習。會友既省費二十餘元，而弟亦免奔走，最為便利。」<sup>29</sup>

章太炎一面講學，一面開始修改舊作《煊書》，此事也引起錢玄同的關注。他在1909年9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章師近改訂

<sup>24</sup>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上冊，頁61。

<sup>25</sup> 關於章太炎在東京講學時間的考訂，參見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上冊，頁167-168。

<sup>26</sup> 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收入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47。

<sup>27</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23。

<sup>28</sup>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上冊，頁60、61、68、71。

<sup>29</sup> 章太炎，〈與錢玄同〉，收入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頁102。

《煊書》，取集中諸文復多加入。惟余意周秦諸子固即為其人之集，但古人交通事少，書札往來乃極罕事，又為人作序及長篇之信辭亦未有，故與人言語均可入子。後人事多於古，似宜分開，以發表意見者為子，而其他著作皆入集部，似為妥洽。」<sup>30</sup>兩個月以後，他又在日記中談到：「至師處還集，師言《煊書》擬改過，將集中諸信札說理之文入之，更名曰《檢論》云。集中說小學之文另行歸開，此外，如傳、序等等無可歸類之文，則入集。」<sup>31</sup>現存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一冊章太炎手改本《煊書》，其中目錄顯示，章太炎確曾計畫將 1906 年以來所寫的文章與信函加入書中，包括致王鶴鳴、劉師培、劉揆一（1878-1950）等人的書札，這與錢玄同在日記中所言相符。<sup>32</sup>但後來出版的《檢論》從篇目上看並無書札，皆為就某一專題展開討論的文章。與錢玄同在日記中所談的文集體例互證，極有可能的情況是他曾當面向章太炎提及自己的想法，最終影響到章氏決定在《檢論》中不收書札。

張榮華通過分析章太炎與錢玄同共同探討修明禮教與放棄禮教、表彰顏元（1635-1705）與顧炎武（1613-1682），強調二人皆十分關注當下社會道德，指出：「錢玄同與章太炎雖然各有不同的思想主張和學術特色，仍能夠葆有純真的師生情誼並且善始善終，根本就在於他們所樹立的相同人生觀，為其一生共同的安身立命之處。」<sup>33</sup>這一認識頗有助於理解為何章、錢二人關係緊密。<sup>34</sup>若進一步來看，章太炎在當時目睹世風學風，強調「凡論學術，當辨其誠偽而已。《世說》雖玄虛，猶近形名，其言間雜調戲，要之中誠之所發舒。《中說》時有善言，其長誇詐，則甚矣。」<sup>35</sup>他之所以主張「思鄉愿」，便是有感於「自唐以降之狂狷者，自辭章誇誕

<sup>30</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76。

<sup>31</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95。

<sup>32</sup> 關於這一篇目，參見《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127-130。

<sup>33</sup> 張榮華，〈錢玄同思想中的師承因素（代導言）〉，收入張榮華，《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錢玄同卷》，頁10。

<sup>34</sup> 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言，「用所謂道德來衡量品評一切，是章太炎非常突出的思想特徵。」參見李澤厚，〈章太炎剖析〉，收入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2010），頁418。

<sup>35</sup> 章太炎，《檢論·案唐》，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458。

至。」他們「敢諫似直，薦賢似忠，搏擊似勇，廉察似慧，平反似恕，周急似任，讓爵似高，一節才著，其名播於歌詠。」而究其實際，彼輩「流汗聲色，瀆貨無厭，內不慈於親戚，又奸同產，外則賣朋友，其為狂者，不以為譽，即以為權藉也。」反之，「鄉原者，多持常訓之士」，具備庸言庸行。<sup>36</sup>相較於以「激濁揚清」自命者虛偽誇飾，那些恪守基本道德的「鄉愿」反而更顯厚重誠樸。章太炎論述清學史，在極力表彰不慕利祿、潛心治學的樸學家同時，大加抨擊高居廟堂之上的「理學名臣」，認為同樣是宗尚理學，「宋、明諸儒多迂介，而清儒多權譎。」像湯斌（1627-1687）熟於吏治，精於取予之術，故意結交孫奇逢（1585-1675）、黃宗羲（1610-1695）等遺老以托虛名，又標榜調和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2），以此自鳴其高。李光地（1642-1718）行徑厚顏無恥，既出賣朋友，又不檢私行，憑善於體察上意而深得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在位）寵愛，卻以大儒自居。故章太炎指出，自諸遺老去世後，「道學亦亡矣」。<sup>37</sup>而當時士風在章太炎看來，「樸學之士多貪，理學之士多詐，文學之士多淫，至外學則並包而有之」。<sup>38</sup>他感慨：「綜觀十餘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氣節，而下者或苟賤不廉與市儈伍，所志不出交遊聲色之間。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類而共非之，特其競名死利則一也。」<sup>39</sup>總之，在章氏眼中，士林風氣趨於作偽，各種堂而皇之的理由多變為時人邀名逐利的憑藉。

章太炎此番時代感觀，也曾向錢玄同提及。後者在日記中寫道：「與師言禮儀必須復古，師言惟祭禮則今日萬不能行，蓋房子構造法大異也。又如士相見禮，虛文太多，可從省。」<sup>40</sup>表明章氏在禮制問題上，主張將去除實際意義不大的繁文縟節，使禮制真意得以顯現。錢玄同在思考道德問題時，也著眼於如何在人倫行

<sup>36</sup> 章太炎，〈思鄉原上〉，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130。

<sup>37</sup> 章太炎，《卮書（重訂本）·別錄乙》，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350。

<sup>38</sup> 章太炎，〈革命道德說〉，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290。

<sup>39</sup> 章太炎，〈箴新黨論〉，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301。

<sup>40</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59。

事方面去其詐偽，返乎真摯。章太炎於重訂本《尙書》中表彰顏元（1635-1704）之學，稱讚後者「形性內剛，孚尹旁達，體駿馵而志齊肅」。<sup>41</sup>唯一不滿者，便是顏元過於主張力行，忽視書本知識的重要性。或許受此影響，錢玄同也開始關注習齋之學，在他看來，顏學實為醫治晚近以來社會道德弊病的良方：

顏氏之學，雖偏重於學習，而於讀書一方面太加輕視，然此亦時勢使然。當時如侯方域（1618-1654）、陳其年（1625-1682）、錢謙益（1582-1664）、吳梅村（1609-1671）輩，日日讀書，而卒之非得罪名教，即降於異族，是空讀書者反受書累也。今之晦盲否塞更甚於明世矣，非行顏氏之教，固亡以振興實學。<sup>42</sup>

章太炎在〈革命道德說〉一文裡，極不滿當時士階層的道德水準，認為他們在此一方面不能與農夫商販相比，知識愈多，道德愈劣。<sup>43</sup>與之相似，劉師培在〈清儒得失論〉中從道德氣節角度評價清代各學術流派，指陳清儒雖所學各異，但總體而言品行多流於卑劣齷齪，工於詐偽誇誕，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sup>44</sup>章太炎的文章錢玄同自然很熟悉，劉師培的論著，錢玄同在日記中也時常記下讀後感想，應當也是比較瞭解。他在這裡以明末清初士人為例，認為彼輩雖然遍覽詩書，但在行誼出處上，不是「得罪名教」，便是「降於異族」，詩書教化，並未體悟於心，因此急需援引強調身體力行的顏元學說，使士人立身處世臻於體用兼具，言行合一。為此錢玄同特意致信在清季大力提倡晚明遺老學說並搜集刊印其著作的鄧實（1877-1951），托後者代為購買顏元著作。他對鄧實說：「顏先生躬習正學，以身率教，堯、舜、周、孔、三

<sup>41</sup> 章太炎，《尙書（重訂本）·顏學》，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149。

<sup>42</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79。

<sup>43</sup> 章太炎，〈革命道德說〉，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289-292。

<sup>44</sup>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收入章太炎、劉師培等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53-164。

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炳然大明，剛主、昆繩承之，聖道益著，誠使當日及門者眾，其學由北而南，漸乃普遍全國，禮、樂、兵、農、水、火、工、賈諸科，一一見諸實行，則唐虞三代之隆，不難復睹於今日，蠻夷滑夏，祛除匪難事矣。」<sup>45</sup>在這裡，錢玄同對普及顏學報以極大期望，甚至認為有助於革命成功，由此可見他嚮往通過強調躬行實踐來一掃各種道德弊病。

民國成立後，許多人先期刊盼的清明之世並未出現，而是周遭種種，倍顯亂象頻頻，危機四伏。錢玄同感慨：「土地雖復，人心之污濁則較清季愈況，顏公所譏彈琵琶、學鮮卑語者，世方以為能，棄國故，墮禮防者，比比皆是。余志既與世違，亦難竊位而已。自九節一日始，復作日記，以今後毋間斷期。回思此兩載中，土地復，政體更，歲首移，徽識易，平日憤異族主我，嫉君主世及，至此乃可消釋。而邦人諸友毀信廢忠，芟夷國華，亡國之徵，已大顯著。長是不改，將不五稔，悲從中來，聊覆書之。」<sup>46</sup>他感歎社會上的道德水準並未因滿清政府被推翻而有改觀。關於這一點，他似乎曾與章太炎去信討論，在回信中章太炎說：「僕意齊民可以理義喻，遊民不可以道德化，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大有驪山之阮，小則繡衣之誅，非是不足使全國肅清。」<sup>47</sup>章氏對著書說教已不抱希望，而是主張借助法家式的嚴刑峻法來整齊道德、改善風俗，這背後其實表明他和錢玄同一樣，對新政權下的許多現象深為失望。1912年12月2日，錢玄同拜訪同門康心孚（1884-1917），並邀請黃侃與汪東一同聚會酒肆，他在事後感歎：「黃、汪固好學之徒，而今日之席中言不及義，所言不出戲劇，詢之，則以欲圖糊口，不暇為學為辭。咳！熱中者日競逐於議員官吏之場，其名為自好者又皆以醇酒婦人消損其精神，民國蓋真無人矣。」目睹斯景，他進一步反省：

至此始知章師之言真是確論。章師固言修明禮法與放棄禮

<sup>45</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99。

<sup>46</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上冊，頁219。

<sup>47</sup> 章太炎，〈與錢玄同〉，收入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頁147。

法者皆是也。然修明禮法必如顏、戴（震，1724-1777），否則流於虛偽。放棄禮法必如嵇（康，223-262）、阮（籍，210-263），否則流於放僻邪偽矣。夫以嗣宗之狂，容甫之介，曾有荒淫女色、優伶，流連不反之事乎？余也抱作顏、李（塏，1659-1733）之心，而行同嵇、阮，固有為為之。自問禮法雖放棄，而未嘗敢得罪名教也。<sup>48</sup>

前文提到，章太炎認為魏晉之人雖宗尚玄虛，但毫無誇飾，隋代王通（584-617）儘管高言禮義，實流於虛偽，這一點對錢玄同影響頗深。他所談的以「顏、李之心」，行「嵇、阮之道」，便是強調自己立身行事雖然表面上不羈禮法，但懷抱甚高，出於至誠。與所謂「名教」看似相反，實則相成。而當時的許多人卻是借禮法來行其偽，心中所念不外乎聲色貨利，道德水準甚為卑劣。他的這些看法與章太炎一脈相承，即強調行為處事中的「辨誠偽」。

因此錢玄同便常以這種標準評價相識之人。在章門弟子中，吳承仕（1884-1939）與章太炎關係也非常緊密，章氏被袁世凱軟禁北京時，吳承仕時常前往探望，並筆錄章太炎的論學之語，撰成《葑漢微言》一書。而在錢玄同看來，吳承仕便是道貌岸然、言行不一者。他在 1934 年的日記中寫道：「《文史》第四期出版，吳處士化名為『黃學甫』談大眾語，真令人齒冷。『腐、惡、投』三字，惟此君最配矣！」<sup>49</sup>不久之後，為了幫章太炎刊刻著作，錢玄同又自言：「得吳處士信，云章師又來函請問書何日可刻成事，他說老夫子『不怒而威』，可笑！明日作一書與老夫子，『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且看吳處士還有什麼話來嘮叨。」<sup>50</sup>他或許感覺到吳承仕耍弄手段、狐假虎威，在借章太炎來「壓」自己，因而有此憤慨。到了 1935 年 9 月 21 日，錢玄同應吳承仕之邀相聚面談。他在當日的日記中記下吳承仕的樣態，「往則見躺在躺椅上，

<sup>48</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43。

<sup>49</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頁1053。

<sup>50</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頁1079。

翹起只腿，慢慢吸煙，真是小布林模樣也。」<sup>51</sup>吳承仕當時已秘密加入中共，參與中共北平地下黨的許多活動。或許對此有所耳聞，錢玄同看到吳承仕的這副模樣，遂報以不屑，稱其「小資」派頭十足，毫無無產階級氣質，並鄙夷其言行不一。

或許是風聞錢、吳二人不和，章太炎特意致信吳承仕，談及「玄同以半農（劉半農，1891-1934）、晦聞云亡，時時出涕，不可謂非有情人，其得病亦頗類中風，所謂神經性者是也。始慕嵇、阮，亦為增病之藥，今慕顏之推（531-591），庶幾得侯氏黑散矣。」<sup>52</sup>向後者強調錢玄同真摯而不修飾的性格，受到刺激後往往流於偏激，勸吳承仕多加包涵。不久之後，章氏復致信錢玄同，指出「足下始慕嵇阮，蓋亦激於時事，龍性難馴，誠未易驟擬」，而此刻日本侵華之念日熾，國難加劇，北方數省很可能被日本侵佔，時遭亂世，「彼在位者，唯有作夷甫排牆而死；在野亦難容嵇、阮矣。」因此認為錢玄同應多效仿顏之推，「小宛詩人之言，蓋庶幾處亂之道也。」<sup>53</sup>勸錢玄同涵養性情，接人待物，多加包容，少動肝火，這樣方能有益身心。晚年章太炎雖在文章著作中依然堅持己見、不媚流俗，但已不像早年那樣鋒芒畢露、口無遮攔，而是愈顯涵養深邃，處世平和。<sup>54</sup>他之所以如此規勸錢玄同，或是瞭解這位大弟子在性情上與自己甚為相似，因此將自己晚年的處世心得告知後者，以示關懷。

所以錢玄同對於章太炎，雖後來在思想見解上不無歧異之處，但仍舊視之為近代歷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在1916年10月6日的日記裡，當時已顯現反傳統思想端倪的錢玄同，重新思考宋恕（1862-1910）、夏曾佑（1863-1924）在清末曾討論過的話題：神州長夜誰之咎？<sup>55</sup>在錢氏看來，真正的禍首乃秦相李斯（284B.C-

<sup>51</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頁1130。

<sup>52</sup> 章太炎，〈與吳承仕〉，收入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頁369。

<sup>53</sup> 章太炎，〈與錢玄同〉，收入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頁154。

<sup>54</sup> 李源澄，〈章太炎先生學術述要〉，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李源澄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第3冊，頁1459。

<sup>55</sup> 關於二人對此問題的討論及意義，參見朱維錚，〈神州長夜誰之咎？〉，收入朱維錚，《音調未定的傳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251-261。

208B.C.)。但同時他依然認為，這兩千餘年來中國學者當中仍有出類拔萃者：

李之後有賈誼，董之後有司馬遷、王充、王弼、阮籍、鮑敬言、陶潛、劉知幾，韓之後有周敦頤、邵雍、程顥、張載、葉適、陳亮，程之後有陸九淵、鄧牧、陳獻章、王守仁、王艮、黃宗羲、顏元、戴震諸人而已。至於近世，始有有思想者，康有為、廖平、宋衡、夏曾佑、譚嗣同及本師章君而已。若梁啟超，若蔣智由，若蔡元培諸君，因人成事，尚未足以語此也。<sup>56</sup>

在時流之中，錢玄同認為章太炎堪稱「有思想」者，而影響頗廣並深受青年學子青睞的梁啟超、蔡元培（1868-1940），只算是「因人成事」而已，可見他依然對章太炎充滿崇敬。1922年7月4日，錢玄同「取章師論學信整理之，凡廿六封。有原信者廿四封，其中前半□□封（連無稿者二封）。庚戌秋冬在海寧時曾經抄出，但滿紙古字，較原信尤難看，擬暇時用普通字體再抄一遍，而將原信裝裱保存，至庚戌所抄之半部亦可保存也。」<sup>57</sup>他非常珍惜這些與章太炎往來的書札，視若至寶。

不過即便如此，1920年代錢玄同在北京各大學任教，並積極參與宣傳新思想，章太炎則居於滬上，一方面力倡保存傳統，反對一味趨新；一方面難以完全與政治絕緣，通過發表通電、組織團體，先是宣揚聯省自治，之後積極抵制北伐。直至1932年，上海附近爆發中日衝突，章太炎決定離開危城，北上講學。3月2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午回家，飯畢，即訪幼漁。與同至花園飯店訪老夫子，別來十六年矣。近來態度如舊，益為和藹，背頗駝，惟發剪極短，與當年披髮大不相同。」<sup>58</sup>在之後的日子裡，錢玄同陪同章太炎往各處講學，拜訪北平各路學人，謄錄章太炎

<sup>56</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93。

<sup>57</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420。

<sup>58</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849。

著作的書稿，並負責籌款刊行這批著作。<sup>59</sup>章氏非常感激弟子為此付出的辛勤勞動。在錢玄同手書的《新出三體石經考》一書中，他特意撰寫一跋文：

吳興錢夏，前為余寫《小學答問》，字體依附正篆，裁別至嚴，勝於張力臣之寫《音學五書》。忽忽二十餘歲，又為余書是考。時事遷蛻，今茲學者能識正篆者漸希，於是降從開成石經，去其泰甚，勒成一編，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稿本尚有數事未諦，夏復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識之。夏今名玄同云。民國二十二年三月章炳麟記。<sup>60</sup>

此跋看似平淡，實則情誼至深，只是許多往事盡在不言中，特別是一句「忽忽二十餘歲」，蘊含著多少滄海桑田之感。章太炎與錢玄同，在近代中國這一紛紛擾擾、非驢非馬的環境裡的真摯交情，於此可窺一二。

### 三、從復古到反傳統

錢玄同出身書香門第，自幼便深受中國傳統學術薰陶，因此在青年時代對此極為認同。戊戌（1898）以來，譚嗣同（1865-1898）、梁啟超等人出於對時局的極度憂患，撰文宣揚「衝決網羅」，提倡破壞之道。梁啟超聲稱：「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教、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而文藝、技術、名物，何一不經過破壞之階級以上於進步之途也？」<sup>61</sup>在此風氣下，許多人大肆抨擊傳統道德與倫理，視其為妨礙中國進步的禍害。錢玄同目睹斯景，堅持「東方學者提倡孝弟，實極有至理，斷不能以『舊

<sup>59</sup> 關於章太炎北游講學時錢玄同的相關活動，參見張榮華，〈錢玄同思想中的師承因素（代導言）〉，收入張榮華，《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錢玄同卷》，頁1-5。而關於章氏此次講學在學界所產生的影響，參見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講學的文化象徵〉，《歷史研究》，4（北京，2002.8），頁3-19。

<sup>60</sup> 章太炎，《新出三體石經考》，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7冊，頁659-660。

<sup>61</sup> 梁啟超，《新民說》（臺北：文景書局，2011），頁81。

道德』三字而一概抹殺。」他甚至視「維新志士」為「社會之蠱賊」，其人「可以杖逐，可以鞭驅」。<sup>62</sup>顯示出他對當時的新思潮並無好感。他認為「六經固為國粹，萬無廢棄之理。」<sup>63</sup>既有這樣的思想基礎，那麼錢玄同遂與章太炎在思想上極易契合。

章太炎自庚子事變（1900）後，對清廷徹底絕望，立志於排滿革命。他通過回顧文藝復興以來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歷史，指出：「興復舊物，雖耕夫紅女，將有任焉。異國之不忍，安忍異種？異教之不耦俱，奚耦俱無教之狼鹿？」<sup>64</sup>強調只要身陷異族壓迫，被壓迫者反抗之心就會遍佈各個階層。而最能激發起人們愛國熱情者，在章氏看來莫過於本國之「國粹」。他轉述印度友人的觀點：「民族獨立，先以研求國粹為主，國粹以歷史為主。自余學術，皆普通之技，惟國粹則為特別。譬如人有里籍，與其祖父姓名，他人不知，無害為明哲；己不知，則非至童昏莫屬也！國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覺心，有是心，所以異於動物。」<sup>65</sup>有人質疑所謂「國粹」，其中糟粕極多，過度提倡會有礙進步。對此章太炎指陳：「國粹誠未必皆是，抑其記載故言，情狀俱在，舍是非而徵事跡，此於人道損益何與？」反之，「國粹盡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與犬馬當何異哉？人無自覺，即為他人陵轢，無以自生；民族無自覺，即為他民族陵轢，無以自存。然則抨彈國粹者，正使人為異種役耳！」<sup>66</sup>

與章太炎看法相似，鄧實（1877-1951）、黃節（1873-1935）、劉師培、馬敘倫（1885-1970）等有革命傾向的士人目睹時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反之因近代中國國勢衰微而「遷怒」於中國傳統學術，對之棄若糞土，因此創辦《國粹學報》，希望藉此宣傳「國學」，從而表彰傳統，振衰起微，同時激勵民氣，鼓吹民族主義。黃節強調：「立乎地圜而名一國，則必有其立國之精神

<sup>62</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5。

<sup>63</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4。

<sup>64</sup> 章太炎，《尙書（重訂本）原人》，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168。

<sup>65</sup> 章太炎，〈印度人之論國粹〉，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383。

<sup>66</sup> 章太炎，〈印度人之論國粹〉，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383-384。

焉，雖震撼摻雜，而不可以滅之也。滅之則必滅其種族而後可。滅其種族，則必滅其國學而後可。」因此「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基於此，他痛陳：「不自主其國，而奴隸於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於人之學，謂之學奴。奴於外族之專制固奴，奴於東西之學說，亦何得而非奴也。」<sup>67</sup>只是在對「國粹」的認識上，章太炎雖然借用這一源自近代日本的名詞，但卻能主動反思東學與西學，努力從中國歷史本身出發闡釋傳統學術之價值。而許多《國粹學報》的作者，名為闡揚國粹，實則是在用傳統學術比附各種西洋學說，因此往往本心是在表彰，但卻導致傳統脫離具體歷史脈絡，造成其虛無化。<sup>68</sup>

章太炎等人眼中的「國粹」，一個主要內容便是晚明遺老之學說與事跡。在這一點上錢玄同也深受影響，他在1907年4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

晚看《國粹學報》之《五石脂》，雖系零星軼事，而足補史缺者頗多，且玩其詩歌、觀其人物，可詠、可歌、可快、可恨之事頗多，令人崇拜英雄之念。蓋明末死難之臣，不特對於國家之倫理同興，即種種私德亦均可風。滿洲猾夏，廉恥日喪，求如此者，竟不可得。異族亂華如此。可畏可畏。<sup>69</sup>

在那一時期，《國粹學報》的作者群體時常撰文表彰晚明遺老的思想主張，同時選刊其遺文，在圖片一欄中印行他們的畫像或墨跡，此外公開佈告，廣為搜求他們的文章著作。章太炎後來為黃節撰寫傳記，談到他與鄧實等人「集國學保存會，搜明清間禁書數十種作《國粹學報》，以辨夷夏之義」，影響所及，「士大夫傾心光復自此始。」<sup>70</sup>這一評價相當準確。而在諸人當中，出身經學世

<sup>67</sup> 黃節，〈《國粹學報》敘〉，收入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頁17-18。

<sup>68</sup> 王汎森，〈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頁123。

<sup>69</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93。

<sup>70</sup> 章太炎，〈黃晦聞墓誌銘〉，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5冊，頁296。

家的劉師培尤為引人矚目，他舊學功底極深，且廣泛流覽新知，時人常將他與章太炎相提並論。不過錢玄同卻不這樣認為，他在日記中寫道：「晚取劉氏《中國文學教科書》觀之，見錯字甚多，因取《說文》等書斟正之，然立說每誤，謬處亦頗多。劉氏固近今之碩儒，章氏以後，當推此公，惟博而亂，是其病耳。」<sup>71</sup>從中可見，他一方面不滿劉師培治學「博而亂」，另一方面顯現出極為推崇章太炎。因此錢玄同在當時對中國傳統的看法便深受章氏影響。

錢玄同在後來的文章裡回憶，他在青年時代「讀完太炎先生的書，才恍然大悟二百餘年以來滿廷之宰割漢人，無所不用其極。什麼『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之深仁厚澤』，原來是『玄燁、弘曆（1711-1799，1735-1795 在位）數次南巡，強勒報效，數若恒沙』！什麼『今上聖明』，原來是『載湉（1871-1908，1875-1908 在位），小丑未辨菽麥』！滿洲政府如此可惡，真叫我氣破肚，章鄒的主張，實在是『有理啊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sup>72</sup>而當他與章太炎熟悉之後，「那時對於太炎先生是極端地崇拜的，覺得他真是我們的模範，他的議論真是天經地義，真以他的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sup>73</sup>猶有進者，錢玄同自言當時他對待傳統的態度，較之章太炎更為極端：「太炎先生對於國故，實在是想利用它來發揚種性以光復舊物，並非以為它的本身都是好的，都可以使它復活的。而我則不然，老實說罷，我那時的思想，比太炎先生還要頑固得多。我以為保存國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復舊物；光復之功告成以後，當將滿清的政制儀文一一推翻而復於古。不僅復於明，且將復於漢唐；不僅復於漢唐，且將復於三代。」總之一句話，「愈古愈好。」<sup>74</sup>周作人也回憶，錢玄同在日

<sup>71</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08。

<sup>72</sup>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的變遷〉，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2卷，頁110-111。

<sup>73</sup>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的變遷〉，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2卷，頁113。

<sup>74</sup> 錢玄同，〈三十年來我對於滿清的態度的變遷〉，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2卷，頁114。

本期間「有時和太炎談論，在大家散了之後仍舊不走，談到晚上便留到《民報》社裡住宿，接著談論。談些什麼呢？說來是很可笑的，無非是討論怎樣復古罷了。蓋當時民族主義的革命思想的主張是光復舊物，多少是復古思想，這從《國粹學報》開始，後來《民報》也是從這條路上發展。」在周作人看來，章、錢二人當時的思想「大抵多是發思古之幽情，追溯漢、唐文明之盛。」<sup>75</sup>與錢氏相似，劉文典（1889-1958）也回憶自己青年時代受教於劉師培，受其影響，不但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撰文寫字也要用古體字，以此體現自己「抗志慕古」。<sup>76</sup>

在錢玄同的日記中，確實可見他一意復古之念非常強烈。他在1909年1月22日的日記裡說道：「余今年廿三歲。回憶自十二歲喪父以來，忽忽十年，所作所為，無一是處。今幸迷途之未遠，迷陽之可復，故今歲以後，當壹志國學，以為保持種性，擁護民德計。其有餘暇，或治他國文字（如印、法、德、英等）。至於當世所謂當行□□之學，一切置之項後矣！」<sup>77</sup>一年後又言：「吾謂誠有人等，合乾、嘉諸儒之經訓，今文學派之經義，而以顏、李之毅力行之，則聖學昌明不難復睹矣。」<sup>78</sup>不過他並不像章太炎那樣全盤梳理中國傳統學術，而是有其側重。章太炎認為歷史是國粹最主要的載體，而在歷史之中，語言文字乃重要組成部分。他說：「文辭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學，所以文章優美，能動感情。兩宋以後，小學漸衰，一切名詞術語，都是亂攪亂用，也沒有絲毫可以動人之處。究竟甚麼國土的人，必看甚麼國土的文，方覺有趣。像他們希臘、梨俱的詩，不知較我家的屈原（340B.C.-278B.C.）、杜工部（712-770）優劣如何？但由我們看去，自然本種的文辭，方為優美。可惜小學日衰，文辭也不成個樣子。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

<sup>75</sup> 周作人，〈錢玄同的復古與反復古〉，頁7。

<sup>76</sup> 劉文典，〈我的思想變遷史〉，收入諸偉奇等編，《劉文典全集補編》（合肥：黃山書社，2008），頁25-26。

<sup>77</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45。

<sup>78</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04。

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sup>79</sup>在這裡，章太炎對語言文字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藝復興史事的啟發。而隨著他對斯學的進一步深入探討，他更反復宣揚其重要性：「若夫理財正辭，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莫大乎文字。」<sup>80</sup>「蓋小學者，國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豈專引筆劃篆、繳繞文字而已。」<sup>81</sup>基於此，章太炎審定各地方言，探究中國語言文字之本，撰寫了《文始》、《新方言》等著作，這對錢玄同影響尤為深刻。他經常就此事與章太炎展開討論，如 1908 年 5 月 13 日「與太炎論中國字體宜厘正事，予謂宜以五百四十部首之體寫正，而後各以所屬之字，從各部首而更正，則無謬而可劃一矣！太炎謂然。」<sup>82</sup>1909 年 1 月 29 日他「晚間在炎師處談天，余主張廢楷用篆說，炎師不甚許可，意其難行也。惟謂《說文》所無之字，作宋體之楷書太不佳，無已，則作隸或八分，庶稍雅觀。余亦甚然師言。」<sup>83</sup>總之在那一時期，錢玄同認為：「中國文明之備，果能循是發揚而光大之，不特不亡，且可永存昌大也。然聲名文物，一壞於唐，再壞於宋，沿及元、明，逮至本朝，雖中經乾、嘉諸儒之提倡，而意只在考古，不在復古，且髡發左衽，形式已變，故學術雖復昌明，而仍無裨於實際。十稔已還，東西留學生，上海僮僕，學堂洋奴，相繼輩起，首倡廢國文，廢舊書之論，而退率遂大劇。近來莘莘髦士，試作便條且多不通者矣，此誠可歎，亦可見文化之易移乃如是也。愚謂立國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學術修明，必賴文字正確，士生今日，誠能潛心正名之事，實為扼要之所在也。文字一滅，國必致亡。借觀印度、波蘭，可為殷鑒。若云文字縱亡，語言猶在，未易廢也，此亦不然。今之語言漸不典則，猶賴有文字以匡之，若棄文存語，是無皮之毛，

<sup>79</sup> 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之演講〉，收入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頁 6-7。

<sup>80</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略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7。

<sup>81</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略說》，頁 10。

<sup>82</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 131。

<sup>83</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 145。

無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務，實在復保氏之教為最要。」<sup>84</sup>凡此種種，除去一二細節，基本皆為對章太炎學說之繼承或引申。直至民國建立後，錢玄同在浙江任教，依然持此見解。1912年10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晨至高校上課。學生復以楊雄（53B.C.-18B.C.）姓相纏，說之再三，終不見信，甚至引出字典以與吾相抗，並謂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一篇文不可解。無理取鬧如是，可歎！復有一班促我速教。總之，是不要學小學耳。我憤甚，歸擬辭謝之。」<sup>85</sup>由此可見，他對青年學子輕視小學深表不滿，而他的授課讀本，竟是章太炎在東京講授國學時的講義——〈論語言文字之學〉。

錢玄同在1919年的日記裡追憶自己思想變遷軌跡，他說1916年「因為袁世凱造反做皇帝，並且議甚麼郊廟的制度，於是復古思想為之大變。起初對於衣冠禮制反對復古，夏秋間見《新青年》雜誌及陳頌平、彭清鵬（1883-?）諸公改國文為國語的議論，於是漸漸主張白話作文，而於孔氏經典尚不知其為不適用共和時代也。」一年以後，他思想見解更顯激進，「此時始知孔氏之道斷斷不適用二十世紀共和時代，而廢漢文等等思想發生，現在差不多還是這種思想。」<sup>86</sup>可見他深受時局刺激，開始強烈質疑中國傳統能否適用於當下，且對袁世凱利用舊日典章文飾帝制深表憤慨，於是一步步走向激烈的反傳統，大有今是昨非之感。

正當錢玄同思想發生重大轉折時，陳獨秀（1879-1942）、胡適等人以《新青年》雜誌為平台，開始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藉由文體改革，進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這一舉動無疑與錢玄同此刻想法一拍即合。他在1917年的第一天之日記中寫道：「余謂文學之文，當世哲人如陳仲甫、胡適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論，二君邃於歐西文學，必能為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在他看來，「今日欲圖改良，首須與文學之文劃清，不可存絲毫美術之觀念，而古

<sup>84</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87。

<sup>85</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27。

<sup>86</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36-337。

人文字之疵病，雖見於六藝者，亦不當效。」<sup>87</sup>順此思路，他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思想抉擇。在清末，吳稚暉（1865-1953）等無政府主義者在《新世紀》雜誌上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鼓吹廢除漢字，因而遭到章太炎的堅決批判，雙方論戰甚為激烈。錢玄同由於青睞章氏學說，故與後者站在同一立場。然時過境遷，當錢玄同的反傳統思想日漸萌芽時，他遂在日記中自言：

余前所有之《新世紀》，昔緣文網不能攜歸，留置日本，寄存未生許。辛亥革命未生扶病歸國，行篋悉是他人為之整理，致玄同寄存之物不知流落何許。前此因章師疑吳君為「蘇報案」之告密者，遂乃薄其為人。又因其時保存國粹之心理頗熾，而《新世紀》則輸入歐化，排斥國粹，坐是又不以其報為然。由今觀之，告密之事，早經多人證明其無，則吳君之行自無可議，至國粹、歐化之爭，吾自受洪憲天子之教訓以來，棄保存國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今日思之，《新世紀》之報，即為吾國言 Anarchism 之元祖，且其主張新真理，針砭舊惡俗，實為一極有價值之報，故擬托蔡君代覓也。<sup>88</sup>

通過對待《新世紀》雜誌前後態度的不同，可以看到錢玄同與章太炎在思想上已經產生不小距離。而他對「《蘇報》案」的態度，與其說是真正瞭解真相而不再非議吳稚暉，不如說是由於思想主張上漸認同於吳氏，因此帶著傾向性來判定後者不應當為出賣革命同志之人。

既然認定中國傳統是阻礙時代前進的禍首，那麼錢玄同遂開始展開猛烈抨擊。他痛斥：「二千年來民智日衰，道德日壞，雖由於民賊之利用儒學以愚民；而大多數之心理舉不出道教之範圍，實為一大原因。」<sup>89</sup>在那一時期，魯迅（1881-1936）也提及「中國

<sup>87</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96。

<sup>88</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00。

<sup>89</sup> 錢玄同，〈隨感錄八〉，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2卷，頁10。

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sup>90</sup>或許就這一觀點錢玄同曾與他有過互動，即他們都在從中國傳統中尋找致使當下弊病叢生的病根。此外，對於自己在清末時曾極力回護的「國粹」，如今定義也完全改變，不再是漢唐典章、經史小學、晚明遺老之學說，而是「垂辮；纏腳；吸鴉片煙；叉麻雀，打撲克；磕頭，打拱，請安；『夏曆壬子年—戊戌年』；『上已修禊』迎神，賽會；研究『靈學』，研究『丹田』；做駢文，『古文』，江西派的詩；臨什麼『黃太史』『陸殿撰』的『館閣體』字；做『卿卿我我』派，或『某生者』派的小說；崇拜『隱寓褒貶』的『臉譜』；想做什麼『老譚』『梅郎』的『話匣子』；提倡男人納妾，以符體制；提倡女人貞節，可以『猗歟盛矣』。」<sup>91</sup>在這裡，他提到的「鴉片煙」、「打撲克」等事物，其實皆非肇自古昔，而是晚近方傳入中國者。但由於他認定新舊雙方，勢不兩立，因愛國心切，故憎惡傳統，<sup>92</sup>將「國粹」這一在清末被許多人苦心塑造，借之來代表中國傳統精華的名詞，填入了大量負面要素，以此收廓清「餘孽」之效。

在當時的反傳統思潮裡，錢玄同最具代表性的舉動便是極力鼓吹廢除漢字。1918年1月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獨秀、叔雅二人皆謂中國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誠欲保種救國，非廢滅漢文及中國歷史不可。此說與豫才所主張相同，吾亦甚然之。」<sup>93</sup>不久之後他又在日記中說：

我近日想這漢文實在是要不得的東西。論其本質，為象形字之末流，為單音語之記號。其難易巧拙已不可與歐洲文

<sup>90</sup> 魯迅，〈致許壽裳〉，收入《魯迅書信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頁18。

<sup>91</sup> 錢玄同，〈隨感錄 二九〉，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2卷，頁15。

<sup>92</sup> 羅志田先生認為，近代中國人在反思傳統時，往往「為了愛國救國，偏要激烈破壞中國傳統」，以至於「愛之愈深，而破之愈烈。」這一觀點，用在新文化運動其間的錢玄同身上非常合適。參見羅志田，〈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再思〉，收入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三民書局，2011），頁118。

<sup>93</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26。

字同年而語矣。而二千年來孔門忠孝干祿之書居百分之五十五，參拜□牝之道家及不明人身組織，說什麼陰陽五行、三焦這些屁話，狠毒過於劊子手的醫生，其書又居百分之二十，誨淫誨盜、說鬼談狐、滿紙發昏夢瘋之書又居百分之二十五。此等書籍斷不可給青年閱看，一看即終身陷溺而不可自拔。<sup>94</sup>

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錢玄同更是強調：「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絕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字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sup>95</sup>他連續用了四個「決不能」來表明自己的態度，儼然中國能否進步，漢字問題，立壁千仞，只爭一線。關於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與國語拉丁化的具體內容，專門研究已有許多，故在這裡不打算展開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章太炎極其重視語言文字之學，視之為一國文明的根本，錢玄同服膺章氏，故立志精研小學，以此光大國粹。而當錢氏走向反傳統之路後，他又將漢字作為文明進步的重要妨礙，認為漢字不除，許多進步事業皆難以展開。可以說在思維方式上，如此重視語言文字，在前後階段裡錢玄同並無二致，而若追根溯源，這其實頗受章太炎對語言文字的定義之影響。因此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其間表面上看起來對漢字深惡痛絕，但若撥開現象看本質，他依然未曾脫離章太炎學術思想的籠罩。<sup>96</sup>

1919年，胡適撰文為當時風起雲湧的新思潮定義內容，其中之一便是「整理國故」：「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

<sup>94</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34。

<sup>95</sup> 錢玄同，〈漢字革命〉，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3卷，頁62。

<sup>96</sup> 當然，錢玄同之所以強調廢除漢字，實與近代以來流行於世的「國民改造論」息息相關，此主張強調藉由民族的自我批判，達到民族的自我改造。參見潘光哲，〈近現代中國「國民改造論」的討論〉，《開放時代》，6（廣州：2003.12），頁30-35。在此論調下，漢字被視為民族劣根性形成的主要禍首，故亟需將其改造，甚至廢除，錢玄同對此三致意焉，便是以改造國民自任，希望能更新國民素質，進而使中國走出衰頹。這一點承蒙審稿人提示，非常感謝！

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sup>97</sup>他登高一呼，知識界上至不甘寂寞的「老少年」梁啟超，下至許多初出茅廬的青年學子，無論舊學功底如何，紛紛參與到「整理國故」的大潮當中。

錢玄同對此亦深表認同，他鑒於廢除漢字絕非旦夕之間可成功，故強調：「國故固然寄於漢字的書籍之中，但漢字書籍之中的國故，只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國故的材料。這種材料，只能供給『國故學者』（如現在的胡適之、梁任公、顧頡剛（1893-1980）諸位先生等）拿去做『整理國故』的取資，絕不是要想得到國故的知識的一般人適用的工具。一般人要想得到國故的知識，惟有讀國故學者整理就緒的有條理有系統的新著。」<sup>98</sup>當時北大文科之中，先前曾佔有一定地位的另一位章門高足黃侃，已經被提倡新文化運動諸公「排擠」離開，前往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2年1月23日，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

鄭介石借給我一本《國學卮林》第一期。此雜誌系九年夏間武昌高師所出版，編輯主任是黃季剛。在浴室中翻閱，其中竟有提倡君臣之說，可謂荒謬絕倫。汪旭初壽某管帶「詩舉人」及自眩之語，看了令人肌膚起粟。其中自然還是季剛的文章稍微好些。然彼所撰之音略，說聲之發音幾無一語不謬，彼自以為訂正江永之說，實在其誤甚於江永。我常主張國學必須受新文化洗禮之人，才能講的明白，今觀此志，而益堅吾說矣。<sup>99</sup>

章太炎在評價諸弟子時曾說「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sup>100</sup>而當錢玄同認同胡適等人的治學方法後，他對師門

<sup>97</sup>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2冊，頁557。

<sup>98</sup> 錢玄同，〈漢字革命與國故〉，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3卷，頁137-138。

<sup>99</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89。

<sup>100</sup>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訂年譜》，頁24。

治學之法自然不再深以為然，因此在這裡遂認為黃侃治小學看似訂正古人，實則謬誤甚多。反觀黃侃，他在當時目睹舉世趨新之風，於日記中如是感慨：「學術有始變，有獨殊。一世之所習，見其違而矯之，雖道未大亨，而髮露耑題，以詒學者，令盡心力，始變者之功如此。一時之所尚，見其違而去之，雖物不我貴，而抱守殘缺，以報先民，不愆矩矱，獨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則二者皆無以為。其為始變，或隳決藩維，以誤群類。其為獨殊，又不過剿襲腐舊，而無從善服義之心。是故真能為始變者，必其真能為獨殊者也。不慕往，不閔來，虛心以求是，強力以持久，誨人無倦心，用世無矜心，見非無悶，俟聖不惑。吾師乎！吾師乎！古之人哉！」<sup>101</sup>在他看來，真能開風氣者，應有獨到心得，而非借新說以惑世人，能開新者，同時也能逆潮流堅持己見。他雖聲稱真能臻於此境者唯有「古之人」，但無疑也認為自己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所作所為，正是在實踐這一標準。1932年章太炎在北平講學時，黃侃與錢玄同當面發生口角衝突，其思想根源也正在於此。<sup>102</sup>而章太炎晚年面對各種新說風起雲湧，非常欣賞黃侃能不為所動。後者去世之後，他感到十分悲傷，在為弟子所撰的墓誌銘中，特意稱讚黃侃「為學一依師法，不敢失尺寸。見人持論不合古義，即眙視不與言。」<sup>103</sup>同一時期他眼中中國學術衰微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新學之徒以一切舊籍為不足觀也。」<sup>104</sup>雖然今日已無從得知章氏寫下這些話時，是否會想起錢玄同所宣傳的廢除漢字、打倒古書之論，但通過這些頗為錯綜的彼此思想抉擇，可以看出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以來，許多觀點

<sup>101</sup> 黃侃，《黃侃日記》（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51。

<sup>102</sup> 當然，在黃侃去世之後，錢玄同對他的評價不再像過去那樣持批評態度。1937年錢氏為林尹的《中國音韻學要旨》作序，指出「黃君邃於小學，聲韻尤其所專長，《廣韻》一書，最所精究，日必數檢，韋編三絕，故於其中義蘊闡發無遺，不獨詮其名詞，釋其類例，且由是以稽先秦舊音，明其聲韻變遷之跡，考許君訓詁，得其文字孳乳之由。」這或許顯示了錢玄同晚年對中西學術的新思考。參見錢玄同，〈林尹《中國聲韻學要旨》序〉，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4卷，頁129。

<sup>103</sup> 章太炎，〈黃季剛墓誌銘〉，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5冊，頁293。

<sup>104</sup> 章太炎，〈制言發刊宣言〉，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5冊，頁166。

已與章太炎漸行漸遠。

不過另一方面，錢玄同作為章門弟子參與新文化運動，這在其他提倡者看來無疑是如虎添翼。當得知錢玄同主張白話文後，陳獨秀頗為興奮的去信對他說：「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sup>105</sup>依陳獨秀等人之見，既有錢玄同加入，則反對白話文的人便很難再以提倡者不通古文為由來對白話文冷嘲熱諷，此外還能藉此告知世人，白話文取代古文乃大勢所趨，以至於連精通小學的太炎門生都表示支持。而事實上，錢玄同模仿反對者語氣用文言製作出的「王敬軒」來函，無疑將宣傳白話文這一議題從乏人理睬變為引發爭論，成功達到了「炒作」的效果。<sup>106</sup>

此外，胡適雖然登高一呼，提倡以新眼光、新方法來整理中國數千年「國故」，但論及對傳統學術的掌握，留洋多年且社交甚頻繁的他，終究難以稱得上功底深厚，這時他遂非常重視因師從章太炎而舊學基礎極佳的錢玄同。他在日記中自言：「叔雅，合肥人，天資甚高，作舊體文及白話文皆可誦。北大國文部能拿起筆來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與玄同兩人罷了。」<sup>107</sup>此處雖在稱讚劉文典（1889-1958），但可見胡適對錢玄同也評價甚高。而在遇到古籍中的難題時，他也會想起錢玄同。1922年2月4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疑心徐積余刻的《隨菴叢書》中的茶斐軒《詞林韻釋》不是宋時之物，已作書問玄同了。」<sup>108</sup>不久之後，胡適計劃撰寫一部《詩經新解》，其中的音韻部分，他甚至打算請錢玄同代筆。<sup>109</sup>當他對錢玄同說起此事時，「玄同贊成我整理舊書的計畫，但我們都覺得此事不易做。現今能做此事者，大概

<sup>105</sup> 陳獨秀，〈答錢玄同〉，收入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卷，頁296。

<sup>106</sup>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收入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11-12。

<sup>107</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頁324。

<sup>108</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頁422。

<sup>109</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頁725。

只有玄同、頡剛和我三人。」<sup>110</sup>可見在胡適眼中，錢玄同適合整理國故，與其說是思想如何新，不如說根本原因是他精通小學。而錢玄同自己雖然表面上對中國傳統深惡痛絕，但在日記中依然顯露出難以對之完全割捨。1923年2月3日，他在日記中反省：「我近來覺得個人的修養真不可少，不必遠談歐美，即宋明學者的修養，能夠取他們幾點為法，便已畢生受用不盡，此乃人命關頭，吾儕實不可不力勉。我近日來常常看《傳習錄》等書，即是此意。」<sup>111</sup>可見在他平心靜氣看待中國傳統時，依然能夠發現其中價值，而他所提及的閱讀《傳習錄》，更是與章太炎晚年表彰王學之舉若合符契。師徒二人雖然在時代狂潮面前分道揚鑣，但依然偶有形成共識的時候。

#### 四、從章氏原經到錢氏原經

錢玄同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地位，除了小學名家之外，便是在1920年代參與影響極大的古史辨運動，全面新詁古代經典，並且在許多文章中稱讚康有為（1858-1927）、崔適（1852-1924）為代表的晚清今文經學，認為彼等所為，既打破舊日經學權威，又開啟今人遍疑群經之先河。他自言：「玄同於一九一一年二月謁崔君請業，識得借讀《新學偽經考》，細細籀繹，覺得崔君對於康氏之推崇實不為過。玄同自此也篤信『古文經為劉歆（50B.C.-23B.C.）所偽造』之說，認為康、崔兩君推翻偽古的著作在考證學上的價值，較閻若璩（1636-1704）的《尚書古文疏證》猶遠過之。」因此「我因為確信《新學偽經考》是一部極重要極精審的辨偽專著，故二十年來對於青年學子們常常道及這書，認為這是治國故的人們必讀的一部要籍，無論是治文學的，治歷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種種國故的，都有讀它的必要。」<sup>112</sup>他的這番言論，表面上看起來和章太炎長期宗尚古文經學，視康有為經學主張為妖妄之

<sup>110</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頁734。

<sup>111</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510。

<sup>112</sup> 錢玄同，〈重論今古文學問題〉，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4卷，頁134-135。

言者截然相反。不過在與錢玄同熟識的黎錦熙（1890-1978）看來，章、錢二人的經學觀卻並非如此涇渭分明：「一般人只看見錢先生並不和他老師一樣的反對『今文』經學，而且研講『今文』，表彰南海，就以為他於章氏的『古文』經學竟無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運動中，大膽說話，能奏吹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觀念就在『六經皆史』這一點上。」<sup>113</sup>黎氏之意，即強調分析二人思想，應透過表面文章，看到他們的內在關係。

章太炎自青年時代起便董理群經，精研小學，求學俞樾門下，對古代經典自是諳熟於胸。在經學見解方面，雖然他強調自己私淑劉歆，認同古文經學，但在當時卻不能免於受今文經學影響，這在他的經學著作與政論文章中皆有體現，如借《公羊》釋《春秋》，以「素王」視孔子。直至後來見解愈發成熟，同時政治上徹底走向革命，放棄改良，這才開始形成自己獨創的一套經學主張。<sup>114</sup>在這之後，章太炎援引並改造章學誠（1738-1801）的「六經皆史」之說，強調「六藝，史也」。<sup>115</sup>關於歷代今古文經學，他指出：「治經恆以誦法討論為劑。誦法者，以其義束身，而有隆殺；討論者，以其事觀世，有其隆之，無或殺也。西京之儒，其誦法既陋隘；事不周浹而比次之，是故齟差失實，猶以師說效用於王官，制法決事，茲益害也。」及至東漢，「杜、賈、馬、鄭之倫作，即知『搏國不在敦古』，博其別記，稽其法度，核其名實，論其社會以觀世，而『六藝』復返於史。」<sup>116</sup>依他之見，今文經學不但常流於荒誕，其汲汲於希圖通經致用，更是違顧事實，極易弄巧成拙。古文經學則強調實事求是，言必有徵，治經不為經世，而在考證史事，藉此以觀上古歷史社會諸樣貌。

猶有進者，章太炎的「六經皆史」之論，早已非實齋舊章，

<sup>113</sup>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收入沈永寶編，《錢玄同印象》，頁68。

<sup>114</sup> 關於章太炎早年的經學主張及其轉變過程，參見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跡的探討〉，《近代史研究》，3（北京，2004.5），頁61-100。

<sup>115</sup> 章太炎，《尙書（重訂本）·清儒》，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152。

<sup>116</sup> 章太炎，《尙書（重訂本）·清儒》，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154。

而是具有他自己的時代關懷。出於對源自近代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想之理解，他強調：「今夫血氣心知之類，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列所系，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sup>117</sup>因此章太炎雖然以史視經，認為「經」字本意只是一種典籍裝訂形式，並無後世所加的崇高意義。<sup>118</sup>但在他看來，「史」絕非僅為古昔遺跡，而是具有重要意涵：「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訖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搢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戎狄，非《春秋》孰維綱是？《春秋》之績，其什佰於禹耶。」<sup>119</sup>歷史的一大作用，即維護民族團結，激起民眾的愛國之心。此外，「素王修史，實與遷、固不殊，惟體例為善耳。百工制器，因者易而創者難，世無孔公，史法不著。《尚書》五家，年月闕絕，周魯舊記，紛雜失倫。宣尼一出，而百國寶書，和會於左氏。邦國殊政，世系異宗，民於何居？工自誰作，復著之《國語》、《世本》。紛者就理，暗者得昭。」<sup>120</sup>在這裡，章氏指陳孔子（551B.C.-479B.C.）作《春秋》是在撰寫史書，其中有體例、有宗旨，「史法」完備，絕非僅是史料彙編，因此方能稱得上「紛者就理，暗者得昭。」

錢玄同在晚年自言：「至廿歲（丙午、一九〇六年）謁章公，廿二歲（戊申、一九〇八）受業，迄今垂卅年，雖亦喜談經學（此與章公無甚關係，止接收其經為古史之說了耳，『古文經』我決不信也）。」<sup>121</sup>然通過他早年日記來看，情形並非如此簡單。1909年11月3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在師處，見善化皮錫瑞（1850-1908）之《經學歷史》，皮氏乃治今文者，其書似講義體，較之劉申叔之《經學教科書》有類稿案者，蓋遠勝之矣，略看一

<sup>117</sup> 章太炎，《尙書（重訂本）·哀焚書》，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328。

<sup>118</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頁53。

<sup>119</sup> 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頁63。

<sup>120</sup> 章太炎，《與人論樸學報書》，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155-156。

<sup>121</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頁1286。

過，擬購之也。」<sup>122</sup>由此可見，他於此時已經接觸到晚清今文經學著作。或許是讀後引起思考，在不久之後的日記中，他如是品評清代宗今文經者：

思國朝今文家，蓋可分為三派：初莊存與、劉逢祿、凌曙、陳立、宋翔鳳、戴子高輩皆恪遵董、何家法，不雜其他誇詞。廖平、康有為輩乃欲合以西人之言，強相比附，不辨家法，不遵師說，惟以一字一句之可附於西學者是尚。至謂六經非因古史成文而參以筆削，堯、舜、禹、湯皆無其人，為孔子之所臆造。此其立說之無據，無怪治古文者之欲屏斥之。平心論之，此派即謂今文者亦應排斥耳。錢塘夏曾佑則以緯釋經，經緯並視，此復與莊、劉輩有異，然實謂今文學最要之務。蓋緯書雖多漢人緣飾之語（如為漢制法等），然尼父微言大義，悉在於是。吾謂欲治今文宜參取莊、夏二家之法，庶幾素王別作之精意可得。至其雜入鬼怪妖罔之談，如孔子感黑龍而生等語，此實古代帝王必應緣飾之事，明知其偽，然非如此，固無由解古史也。夏氏感帝王『感生、受命、封禪』三事，必有孔子為素王，禮亦宜然，此說最精。《春秋》為漢制法，固漢人緣飾之詞，然黜周王魯之說，實素王為後王制法，初不容疑。必云孔子定六經，與中壘校書無殊，此說吾亦未之能信。<sup>123</sup>

在這裡，錢玄同不贊成廖平（1852-1932）、康有為以西學解經典的做法，卻比較欣賞早期今文經學者的治經之道，並認為夏曾佑（1863-1924）重視緯書極為可取。除此之外，他強調治經應探討素王制法精義，為漢制法說雖不可取，但為後世制法則不容置疑。所有這些，皆與章太炎當時的經學主張極相悖。更有甚者，章太炎將上古經書以史看待，其中的核心見解便是在修訂本《噓書》

<sup>122</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95。

<sup>123</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08。

中的〈訂孔〉篇裡，認為孔子是「古良史」，其作《春秋》，類乎劉向（77B.C.-6B.C.）校對群書。而錢玄同則認為此說「未之能信」，很明顯並不認同章氏經學思想中的關鍵點。正因為如此，他幾天以後拜訪章太炎不遇，遂將之前提及的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取回觀看，當看到皮氏強調孟子（372B.C.-289B.C.）關於孔子作春秋的說法不可質疑時，錢玄同認為：「據孟子之言以斷《春秋》之為心，其說蓋實不易之論矣。後世之崇古文而詆今文者，盍亦觀孟子之書乎？西漢今文學家言不足信，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孟子受業於子思（483B.C.-402B.C.）之門人，實為聖人之嫡傳。其說如是，殆不可易。章師尊崇古文，於皮書眉端多駁斥語，要之亦多不足以折服之之語……要之史家之《春秋》，即如《公羊傳》所引，不修《春秋》是也。此固所以記往事者，若孔門之《春秋》，則固孟子所謂天子之事，史公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者，一是史，一是經，原不可合為一也」<sup>124</sup>由此可見，錢玄同受教於章太炎之時，在經學見解上非但對古文經學無甚心得，並且不認同乃師的以史視經之論，而是頗欣賞晚清今文經學的相關主張，特別是其中的「素王改制」之義。

既有這樣的思想基礎，雖然錢玄同一時間不能苟同康有為借西學解經，但對康氏其他方面的論著，以及崔適的辨偽之作，接受起來便不再有太多障礙。1912年10月2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晚取《新學偽經考·藝文志》一卷點之，康氏作此書年少氣盛，往往有過火語，文筆亦不甚經意。然辟偽經之謬，可謂東漢以來所未有。崔氏承之，壁壘益嚴。崔氏經學耆儒，故言多平實，較勝康矣。」<sup>125</sup>第二天，他「與而翁大辯論今古文，而主以事實、典制求古經真面目，孰知《周禮》本歆所偽詔，《左傳》本左丘《國語》變相，亦大半為歆竄亂，古文之典章、事實本不足訓乎！」此外，當日他還「點完〈漢《藝文志》辨偽〉。」<sup>126</sup>又過了

<sup>124</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10。

<sup>125</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30。

<sup>126</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30。

數日，錢玄同「在枕上翻《新學偽經考》，雖精論甚多，究不無過當之論，其蔑視清中葉之言訓詁者尤非，康氏於小學之事諒為門外漢也。又於緯書仍復信之，蓋西漢今文家實不道此，何休今文大師獨昧此事耳！此意自崔君出，可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sup>127</sup>而當得知章太炎痛批今文經學的相關主張皆為「誣詞」或「妖言」時，他則認為「我謂三統三世、五際六情之說，此是學派之不同。章師信古文，故惡此等語。」<sup>128</sup>綜上可見，錢玄同開始進一步的認同康有為的辨偽之說，同時認為能將其發揚光大者首推崔適。而在這一點上，他也與長期和康氏在學術上對抗的章太炎漸行漸遠，甚至背道而馳。唯一留有師說遺跡者，或許是他依然強調清儒的訓詁之功不容忽視，因此不同意康有為對之盡皆蔑視。

在這之後，錢玄同開始拜崔適為師，並對其學說深表青睞。1914年9月18日，他於日記中記載：「今日學校告假。至打磨廠恒發棧訪崔師。崔師謂《左氏》不特書法全非，即事實亦不足信。此言三年前已聞其法，今得假讀《春秋復始》矣。師又言，春秋以前，《詩》、《書》、《禮》、《樂》皆古書，為孔子所修，非孔子所作。孔子果作，何以三百篇非一律？康門以三代事實皆為依託，實中西學之毒。」<sup>129</sup>第二天他又記下：「閱《春秋復始》，據《春秋》義例以正《左氏》事實之不合古史，其言實有金湯之固，非苟為立異也。此說出，足以閱古文家詆毀今文家不明事實，空談書法之誣辭矣。不特王湘綺（1833-1919）之膚淺，廖季平（1852-1932）之怪誕不足道，康長素猶有不盡不實之處，雖劉申受（1776-1829），猶覺其未盡實也。」<sup>130</sup>崔適的經學思想給予錢玄同極大的啟發，讓他開始全面質疑古文經學的觀點。在此基礎上，之後他與顧頡剛開始就古史真偽展開討論時，晚清今文經學便提供錢玄同許多可引為己用的觀點。1921年他對顧頡剛說：「康氏之《偽經

<sup>127</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34。

<sup>128</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40。

<sup>129</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74。

<sup>130</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275。

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個純粹守加法之經學老儒，篤信今文過於天地，他們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殘守缺。他們辨偽的動機和咱們是絕對不同的，但他們考證的結果，我卻認為精當者居多，此意至今未變。我幾年前對於今文家言是篤信的，自從一九一七以來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為劉歆偽作，則至今仍依康、崔之說，我總覺得他們關於這一點的考證是極精當的。我現在以為古文是假造的（《左傳》所記事實自然不是劉歆造的，它的本身是一部與《春秋》毫無關係的歷史），今文是口說流行，失其真相的，兩者都難憑信，不過比較起來，還是今文可信些。」<sup>131</sup>

在談及辨偽工作的重點時，雖然錢玄同認為中國古籍與古史偽造之處甚夥，但相較於子部與集部之書，辨偽群經更顯重要：「過去的學術界，是被『總經』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來多數學者所宗之經，則更是雜湊之書，就是流俗所謂《十三經》也者。所以無論治文學的，治歷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種種國故的，無不宗經——宗《十三經》。他們儘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經』。因為信任『經』的緣故，於是認為『經』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實的史料，一定可以採用的。」基於此，「所以我以為我們現在對於治國故的人們，應該供給他們許多辨偽的材料。而辨偽『經』的材料，比辨偽『史』、偽『子』、偽『集』的材料，尤其應該特別注重。」<sup>132</sup>前文談到，錢玄同自言因目睹袁世凱帝制自為而心生反傳統之念，因此他參與古史辨運動，並成為其中一員猛將，很大程度上並非基於學理上的考慮，而是希望藉此來抨擊中國傳統。1923年他致信周作人：「我年來對於『國故』，對於一切『道德、政治、文章』，久已認為博物院中之陳列品，決然反對拿來應用，故雅不願青年去摩挲，而我自己（和幾個同調的朋友）卻想在博物院中做

<sup>131</sup>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4卷，頁225。

<sup>132</sup>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4卷，頁136-137。

一個『分類』『標籤』的人而已。」<sup>133</sup>所以當顧頡剛推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後，錢玄同去信大加稱譽，認為此乃「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之舉。<sup>134</sup>他自己也說：「咱們現在對於古書，應該多用懷疑的態度去研究它們，斷不可無條件的信任它們，認它們為真古書，真事實，真典禮，真制度。與其過而信之也，寧過而疑之，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sup>135</sup>由於經學自西漢以來長期居於官學地位，若將經學體系瓦解，則可收擒賊先擒王之效。在這樣的考慮下，今古文經學在錢玄同那裡，已經不再是學派上的抉擇，而是從反傳統的角度左右採獲，為我所用。因此對於章太炎的經學主張，他也不再根據今古文的門戶之見來看待。

本乎此，錢玄同在 1921 年 9 月 18 日的日記裡寫道：「下午三時，偕沈士遠（1881-1955）、沈尹默兩君同到中央公園，在園中晤胡適。他從南邊回來有一星期了。我和他談到經典，我以為章炳麟師治經，篤信劉歆之偽古文，固非，但是他的治經的方法甚為不錯。他只把經典當作一種古書看，不把彼當做甚麼聖經看，他對於經典持批評的態度，不持崇拜的態度，這都是很正當的。」<sup>136</sup>認為應肯定章太炎不將經書視為經典之舉。<sup>137</sup>在一年以後的日記中，他進一步主張：

漢代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清代的簡直差得很遠。漢代的只會造假書，今文家的董仲舒造《春秋》，歸之孔丘；古文家的劉歆造《周禮》，歸之周公。於是把歷史完全搗亂，這是遮滿青天的雲霧。清代的是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古文家的章炳麟，痛駁微言大義之說，不信孔子有作經之事實，這是

<sup>133</sup> 錢玄同，〈致周作人〉，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6卷，頁65。

<sup>134</sup>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4卷，頁235。

<sup>135</sup>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後〉，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4卷，頁304。

<sup>136</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78。

<sup>137</sup> 王汎森在分析顧頡剛思想時，指出顧頡剛對康有為有一種「弔詭式的繼承」，即不顧康氏尊儒立場，只將他的《孔子改制考》等書以史學著作視之，吸收其中質疑古史的部分。參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8），頁209-211。這一點，與錢玄同對章太炎經學思想的認知方式極相似。

撥開漢代今文家的雲霧。今文家的康有為，發明古史不足信之說，不信周公有制禮之事實，這是撥開漢代古文家的雲霧。所以有漢代的今文家、古文家而古史之真相蒙，所以有清代的今文家、古文家而古史之真相露。清代的也有烏煙瘴氣之處，此則中漢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撥孔子作經的雲霧，而仍躲在周公制禮的雲霧之下。康君能撥周公制禮的雲霧，而仍躲在孔子作經的雲霧之下。此其蔽也！我們現在應該取他們撥雲霧之點，而棄他們躲在雲霧下之點，則古史真相才能漸漸明白的披露了。<sup>138</sup>

在反傳統的視角下，錢玄同認為漢代經學無論今古文都不足取，不但偽造經書，而且打亂歷史。清代的今古文經學，雖有「撥雲霧見青天」的功績，但只是功成其半，本身依然有局限性，所以應該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從不宗經的角度展開辨偽，如此方能顯現古史「真相」。而章太炎的經學觀也就在這樣的歷史脈絡裡，被錢氏賦予了一定價值。錢玄同在日記中梳理清學史，認為「清代整理國故之學共有三派，他們的價值是相等的」，其中包括「浙東學派」、「徽州學派——即所謂漢學或樸學」、「常州學派——即所謂今文派」，此三派中成就最大者皆為「最後的那個人」，即「甲派——章學誠」、「乙派——章炳麟」、「丙派——康有為」。<sup>139</sup>這此一學術史回顧，便是從「為我所用」的角度出發，來看前人是否有推翻經典權威的萌芽，以此評價其高低。當其時也，胡適表彰清代學者治學中蘊含「科學方法」，並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解釋為「六經皆史料」；<sup>140</sup>顧頡剛對崔東壁（1740-1816）大加讚揚，認為他敢於質疑古史，其時都是出於和錢玄同相似的思路，至於是否符合古人本意，或許就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了。<sup>141</sup>

<sup>138</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487。

<sup>139</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486。

<sup>140</sup> 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7冊，頁114-115。

<sup>141</sup> 對於胡適用「六經皆史料」來解釋章學誠的「六經皆史」，錢玄同自己也不認同，認為「不但有增高解釋之失，實在和《文史通義》全書都不相合。」因此他想撰寫一篇〈述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並且評判它的得失〉作為回應。參見楊天石整

正如錢玄同所言，章太炎否定經典本身有神聖性與權威性，並且質疑宋代以來的「十三經」說法是否準確。<sup>142</sup>不過他視上古經書為歷史著作，背後依然有其強烈的弘揚中國傳統之心，這一點，卻已不是走向反傳統之路的錢玄同所能「瞭解之同情」的了。1925年2月2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說宋以前對於『六經』，除最無思想之博士和經師外，凡有思想之學者並不認為為一物，最高明者，如王充（27-96）、如劉知幾（661-721）皆是也。劉知幾只認《尚書》、《春秋》是史，絕不連類而及於《易》《詩》，三《禮》倒是應該說為『書志』之源，但是他沒有說。可見劉氏不以『六經』為一物也。自宋以後便不然了，經師學究且不論，以章實齋、龔定庵（1792-1841）、康有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猶認為一物或認為歷史，則六經皆史；或認為哲理，則六經皆哲理矣。這實在可笑極了。漢之古文說、今文說尚不如此，惟崔東壁不認為一物，他不信孔子刪定『六經』之說，可謂有特識。梁任公漸能打破，然而這還不太行，至胡適之、顧頡剛始能大解放。」<sup>143</sup>隨後他嘗試用哲學、文學、歷史、字典等晚近方傳入中國的學科分類來劃分經書所屬，認為只有《尚書》、《春秋》、《國語》、《左傳》屬於「歷史」之範疇。<sup>144</sup>即便是歷史，章太炎強調《春秋》等古代典籍是有體例、有宗旨、有系統的著作，然在錢玄同看來：「我以為歷史的知識，求之於線裝書是無法得到的，因為它：（1）只是原料，而且只是原料的一小部分；（2）文章難懂，耗費寶貴的光陰去研究它，實在太不值得。（3）荒謬的部分太多，想得到歷史的知識，非新編許多新參考書不可。」<sup>145</sup>如此這般，可以說與章太炎的經史觀點大相徑庭。

1925年，章士釗（1881-1973）出任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隨後

---

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481。

<sup>142</sup> 章太炎，《尙書（重訂本）·清儒》，收入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159-160。

<sup>143</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622。

<sup>144</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622。

<sup>145</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684。

公開主張學校讀經，錢玄同撰寫〈廢話——原經〉一文，借討論古代經書性質來回應章士釗的言行。很有可能是撰文時想到章太炎收入《國故論衡》中的〈原經〉篇，錢玄同在這裡也用同樣兩個字來概括全文主題。全文通篇嬉笑怒罵，意在將經書的地位與價值極力貶低，如《易經》中的卦辭、爻辭，純為某位「老學究」在「無聊的時候，愛拿那鬼玩意兒的什麼卦呀，爻呀，消遣消遣罷了，正如現在人無聊起來拿一付牙牌來打打五關一樣。」《尚書》「去取之間，是以什麼為標準的？反正不過亂七八糟的史料罷了，有什麼好壞優劣，要那樣的嚴格選取？」《禮記》「其中有的是與《儀禮》同樣瑣碎繁縟的無謂的節文，有的是儒家那種混亂的政治思想與人生觀，此外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妖妄之談。」此外《春秋公羊傳》也類乎此。《論語》雖為孔子思想的記載，但「孔二先生那個人，在二千四百年以前，自然算得上一個人物。但是這位老先生的頭腦實在太籠統了，不要說比不上現代的人，便是宋、明的儒者，他也還比他們不上。」較有價值者如《詩經》，因為其中的淫奔之詩，「能夠赤裸裸的描寫兩性戀慕之情，頗有比得上現在的大鼓、攤簧、山歌之類的。」所以「值得一讀，值得欣賞」。《左傳》「並不是什麼《春秋》的『傳』，它與《春秋》是沒有關係的。」不過「這部歷史，不僅是史料，而且是一部敘事有條理的古代的好歷史，文筆也很優美，可以比得上元、明間的《三國演義》。雖與現代的歷史比，它也未必就配算歷史，但若與《尚書》、《春秋》比，不知道要高過它們幾萬倍。」總之，「然則『經』果為何物歟？據我看來，不過是不倫不類、雜七雜八的十三部古書而已矣。」<sup>146</sup>這些見解表面上看起來與章太炎一樣，都是在取消經書的神聖性，但是章太炎有破有立，經書的地位將被歷史取代，後者是今日保存國故、激勵民德、團結人心的最主要工具，雖然經書不再高高在上，中國傳統卻依然值得肯定與發揚。錢玄同則不然，他這一時期的經學觀與他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性反傳統思想息息相關，詮釋經書性質實

<sup>146</sup> 參見錢玄同，〈廢話——原經〉，收入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2卷，頁223-239。

為推翻中國傳統的主要手段。直至 1938 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北平業已淪陷，錢玄同在病中整理劉師培的著作，當他讀到劉師培論《左傳》的論著時，在日記中寫道：「講《左傳》，應專重事實，越不講義越好。杜注乃講義之中最乾淨之一種，遠勝劉、賈諸人也。故章君暮年之《左氏疑義答問》，遠非劉所能夢見。」<sup>147</sup>章太炎的《春秋左氏疑義答問》，在肯定杜佑（735-812）對《左傳》的詮釋同時，延續自己昔日的經史觀點，從撰寫歷史著作的角度來討論孔子與《左傳》的關係，並極力表彰他眼中《左傳》所蘊含的民族主義。錢玄同的這番肯定，不知是否包含了漸漸重新認同乃師的這些主張。

## 五、結語

1932 年 3 月 12 日，錢玄同與陪同章太炎北上講學的黃侃發生嚴重口角，黃侃記載錢氏當時「面赤」，且「警警爭辯」，<sup>148</sup>錢玄同則直言自己「大怒」，與黃侃「喧嘩了一場」。事後他「忽擬移書章師，說明十六年來之情形，起筆自一時頃至四時頃，不能再寫了，睡。」<sup>149</sup>此函後來寫好並寄出與否，今日已不得而知，令人好奇的是，錢玄同會如何對章太炎訴說他思想變遷的心路。不過到了 1938 年 11 月 5 日，已經身染沉疴的錢玄同，突然想起章太炎在不同時期的講學記錄，打算「以後當將合印」，其中包括了 1906 年在日本的《國學講習會略說》、1913 年在北京的《國學會講義案三種》、1922 年在上海的曹聚仁（1900-1972）記錄本《國學概論》，以及晚年在蘇州的《章氏國學講習會講義》。<sup>150</sup>這一條記載，或可顯示師生二人的深厚情誼與長期的相互關注。

章太炎與錢玄同清末相識於日本，彼時錢玄同甚為崇拜後者，不但仔細閱讀其著作，還在日記中記下心得，同時極力回護章氏，對與其觀點相左者深感不滿。章太炎決定設壇講學，錢玄

<sup>147</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頁1334。

<sup>148</sup> 黃侃，《黃侃日記》，頁767。

<sup>149</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頁581。

<sup>150</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下冊，頁1363。

同奔走聯絡，促成其事。並在此其間常向章氏問學請益，二人學術上的交流頗為頻繁，《煊書》第三次改訂過程中，在收錄文章標準上，章太炎很可能受到錢玄同的影響。在人生觀方面，章、錢頗有共識，即強調「辨誠偽」，於改善民德三致意焉。錢玄同待人善惡分明，對虛偽之徒不假辭色，對此章太炎晚年去信規勸，顯示出極強的關懷之情。

近代以來，新舊中西的問題縈繞於許多知識份子心中，錢玄同青年時代接觸到大量晚清國粹派的學說，並對章太炎借國粹激動種性心有戚戚焉。因此他主張革命成功後的中國應全盤復古，從語言文字，到典章制度，皆應保持中國自身特色，這與章太炎迴護傳統的程度有過之無不及，而他重視語言文字，更是直接受到乃師影響。然民國建立後，錢玄同目睹袁世凱帝制自為，受到極大刺激，對待中國傳統的態度急轉直下，認為傳統文化是導致中國衰微的禍首，因此鼓吹應徹底批判，當年象徵一國精華的國粹，如今成了各種糟粕的代名詞。猶有進者，錢玄同認為漢字是阻礙中國發展的主要禍害，於是提倡廢除漢字、國語拉丁化，這與近代以來流行於世的「國民改造論」息息相關，即藉由批判傳統以達到形塑現代國民之目的。然此表像背後，卻顯示出在思維方式上他依然深受章太炎影響，即非常重視語言文字在一國文化中的地位，因此前後態度，看似相反，實則相成。<sup>151</sup>

在近代中國思想轉型時期，作為帝制時代官方意識形態的經學面臨巨大危機，如何面對龐大的經學遺產，如何在新的時代裡安置經學的地位，甚至如何去除經學義理中與現代性訴求背離之處，凡此種種，都讓近代許多學人參與到經學的闡釋與論爭當中。章太炎在清末重詁經學，將經學從過去的官學地位上拉下來，認為其本身無後世賦予的神聖性。另一方面，他主張以史視經，反對晚清今文經學的種種「怪誕」之語，強調經書乃上古歷

---

<sup>151</sup> 余英時曾以魯迅為例，討論章太炎對五四反傳統思潮的影響，這一點無疑極具啟發。參見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入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62-64。但若論及與章太炎關係之緊密與複雜，錢玄同較之魯迅，實更勝一籌。

史記錄，並且這種歷史絕非散亂無系統的材料，而是有體例、有宗旨的著作，讀之可使人奮發有為，喚起強烈的愛國之心。錢玄同雖然師從章太炎，但對乃師經說吸收之處著實有限。他在清末接觸晚清今文經學，頗認可其中的托古改制、素王變法之說，並對康有為、崔適的辨偽著作青睞有加。在以反傳統為旨歸的古史辨運動中，這些學術積累一觸即發，提供錢氏遍疑群經、推翻古史系統極豐厚的思想資源。在此主旨下，章太炎經學觀中帶有批判色彩的面向遂被錢玄同給予部分肯定，然其「建設」的面向，卻非已立志抨擊舊學的錢玄同所能理解。總之，二人在經學上的關係，絕非時人所說的那般密切，而是看似一脈相承，實則分道揚鑣。但有一點相同，二人都不再視經學為思想文化領域獨尊之物，過去二千餘年的「經學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最後，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中以反傳統健將聞名於世，但其實他自己也常在反省。1921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在兩三年前，專發破壞之論，近來覺得不對。殺機一啟，決無好理。我以為我們革新，不僅生活見解，第一須將舊人偏窄忌克之心化除。須知統一於三綱五倫固謬，即統一於安那其（Anarchism，無政府主義）、寶雪維茲（Bolsheviks，布爾什維克）也是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處而不相悖，方是正理。佛有小乘、大乘，孔有三世之義。其實對付舊人，只應誘之改良，不可逼他沒路走。」<sup>152</sup>雖然這番話只是日記中的自言自語，在公開文章中卻少見這樣的主張，但起碼表明錢玄同決絕之餘，也在思考那種不容他人質疑的一味趨新是否合理。而據黎錦熙回憶，他經常和錢玄同用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典故來開對方玩笑，黎氏認為「此誠『高級趣味』之雋語也！可以隱括一部中國學術思想的源流變遷史矣。」<sup>153</sup>如若此言不虛，則錢玄同在私人場合依然有很強的傳統印記。1929年傅斯年（1896-1950）對胡適說：「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

<sup>152</sup>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67。

<sup>153</sup> 黎錦熙，〈錢玄同先生傳〉，收入沈永寶編，《錢學同印象》，頁91。

的中國人。」<sup>154</sup>這一自我解剖，用在錢玄同身上同樣合適。近代中國遭逢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變，傳統與現代之關係錯綜複雜。正如論者所言，今日評估傳統，應反思五四時代流行於世的全盤反傳統主義（錢玄同即為主要代表之一），同時需正視傳統的深度與複雜性。<sup>155</sup>錢玄同的生命軌跡，經歷了從全盤復古到全盤反傳統，雖然他立論真摯，絕無虛情假意，但亦顯示出在時代浪潮激蕩下，難以平心靜氣揚榷傳統得失。因此種種主張，既缺深度，又乏細緻，反而不能對在當時依然影響極大的傳統展開理性與深入的檢討，特別是忽視傳統的複雜性，故未能真正分疏其中良莠，而那種將傳統與現代簡單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更是影響深遠，造成不小的歷史曲折。相比之下，其師章太炎在近代變局之下，一面大量吸收新知，一面對中國傳統進行了極為深刻且廣泛的闡釋，既非率由舊章，又非一味否定，同時反思、批評西方現代性諸現象。<sup>156</sup>他的具體觀點或值商榷，但這種對待傳統的態度，在筆者看來，或許更值得今人在思考傳統文化轉型與中西文化交融時引為參考。

（責任編輯：齊汝萱 校對：江趙展、陳品伶、謝孟廷）

---

<sup>154</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5冊，頁581。

<sup>155</sup> 張灝，〈傳統與現代化——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收入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121-123。

<sup>156</sup> 關於章太炎思想較為完整且扼要的分析，參見姜義華，《章太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一書。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81。
-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章太炎、劉師培等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桑兵等編，《國學的歷史》，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
- 吳承仕同志誕生百週年紀念籌委會編，《吳承仕同志誕生百週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 楊天石整理，《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錢玄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 朱希祖，《朱希祖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
-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李源澄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
- 梁啟超，《新民說》，臺北：文景書局，2011。
- 黃侃，《黃侃日記》，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 諸偉奇等編，《劉文典全集補編》，合肥：黃山書社，2008。
- 魯迅，《魯迅書信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 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三聯書店，2009。
- 沈永寶編，《錢玄同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 二、近人專書

-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8。

姜義華，《章太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

劉克敵、盧建軍，《章太炎與章門弟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盧毅，《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三、期刊論文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收入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1-38。

王汎森，〈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收入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頁 91-118。

朱維錚，〈神州長夜誰之咎？〉，收入朱維錚，《音調未定的傳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 251-261。

沈尹默，〈我和北大〉，文收中國文史出版社編，《文史資料精選》，第 5 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 427-433。

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收入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 59-70。

李澤厚，〈章太炎剖析〉收入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頁 395-436。

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歷史研究》，3，北京，1999.6，頁 28-32。

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講學的文化象徵〉，《歷史研究》，4，北京，2002.8，頁 3-19。

張榮華，〈錢玄同思想中的師承因素（代導言）〉，收入張榮華，《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錢玄同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 1-10。

潘光哲，〈近現代中國「國民改造論」的討論〉，《開放時代》，6，廣州，2003.12，頁 30-35。

張灝，〈傳統與現代化——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收入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 117-138。

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跡的探討〉，《近代史研究》，3，北京，2004.5，頁 61-100。

羅志田，〈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再思〉，

收入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三民書局，2011，  
頁 93-118。

## Qian Xuantong's Acception and Rejection of Zhang Binglin's Thoughts

Wang, Rui\*

### Abstract

Qian Xuantong and Zhang Binglin met in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Qian was a admirer of Zhang at the time. He read over his books and defended Zhang against people with different views. Qian also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Zhang teaching establishment and they had frequently scholarly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They share the same value of life, which insist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ue and false. Qian Xuantong was exposed to thoughts of Chinese culture quintessence school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at his young age, and agreed with Zhang's claim to incite the nation by Chinese culture quintessence. In his view, language and law must maintain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Qian changed his mind completely after Yuan shikai's restoration. This event led him to believe that Chinese, as a written language,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abolished. However, he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Zhang strongly because of the factor that it was Zhang's theory that language is a vital element of culture. Although Zhang was his teacher, Qian didn't accept much from Zhang. When he learned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Qing Dynasty, he turned to the idea of reforms based upon ancient political system, and became a supporter of Kang Youwei and Cui Shi. His new thoughts later beca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is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thinking during the anti-tradition movement. It could therefore be argued that though Qian adopted Zhang's spirit of criticism but Zhang's theory of "contribution" was beyond his comprehension.

**Keywords:** Zhang Binglin, Qian Xuantong, Binglin School,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study of language

---

\*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